

石刻文献之历史功用

——广西石刻研究之七

杜海军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石刻文献自其发生,因材质易得、风雨不侵、经久耐磨、外力难坏、可传久远,遂受到人们的青睐,以之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诸如昭告国是、助理民生、推动教育发展、传播宗教信仰、记录私人行迹、传播文学、传播书法等;而今看来,这些曾经的信息已成为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人们多将石刻文献作为金石学看待,使得石刻的文献价值未能得以完全发挥。了解石刻的历史功用,会有助于加深学界对石刻文献价值的认识与开发利用,有助于学界对人类发展史各项研究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广西;石刻;文献;功用

[中图分类号] I206.2;J2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14)01-0007-07

石刻自其发生,因材质易得、风雨不侵、经久耐磨、外力难坏、可传久远,遂受到人们的青睐,以之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广泛应用,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传递信息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功用,成为我们今日认识历史的一种重要文献。长期以来,人们对石刻研究的重点在于金石学,对石刻的文献功用注意不够,影响了石刻文献价值的充分开掘与发挥。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早有认识,如欧阳修已关注到石刻的证史功能,“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集古录·序》)也有学者试图全面总结,如叶昌炽总结石刻功用为四点:一曰述德崇圣,二曰铭功,三曰纪事,四曰纂言,并各举数例。柯昌泗批评说叶昌炽列目有缺漏,举例有未合。^{[1]181-182}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将石刻分为墓碑、墓志、造像记、刻经、诗词、题名和杂刻七类^[2],是就体裁而言。毛远明总结为记事赞颂、哀诔纪念、祠庙寺观、诗歌散文、图文碑刻、应用文碑刻、石经、题名题记、几种特殊碑刻等,这种总结,体裁、题材不分,论述较为混乱。

关注石刻的功用,有助于学界对石刻文献价值

的认识与开发利用,有助于充分发挥石刻的文献价值,有助于对社会历史各项研究的深入开展。笔者以为其功用大者盖在七端:昭告国家大事、助理民生日用、推动教育发展、传播宗教文化、记录私人事迹、推广文学创作、传播书法艺术等。

石刻在传播书法艺术方面发挥的功能,显而易见,论述也多,在此不赘,故本文粗分六类以次:

一、昭告国事

古时信息传播手段甚少,国家要事或者政策欲告示天下,刻石就成为一个重要手段。如以石刻记录帝王行程:周穆王“纪迹于弇山之石”^{[3]214},秦始皇巡游泰山等地留下碑刻至今可见。秦后,几乎每个朝代皆有此类存碑。如汉武帝登泰山留《泰山无字碑》,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三年(437)过易州(河北易县)与群臣赛箭石刻《皇帝东巡碑》(1927年发现)。唐开元十四年(726)唐玄宗封禅泰山,摩崖岱顶大观峰《纪泰山铭》。康熙皇帝在曲阜有《过阙里》碑,乾隆皇帝在浙江有《阅海塘记》(乾隆二十七年),嘉庆皇帝在河北围场县有《木兰记碑》(嘉庆十二年)等。

[收稿日期] 2013-1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桂林石刻总集辑校”;广西特聘专家“桂学研究”专项经费资助成果。

[作者简介] 杜海军(1957—),男,河南内黄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宋元文学与文献、金石。

关系国政者更多,如河南临颖县繁城镇存三国魏延康元年(220)华歆率公卿将军上奏请曹丕即位的劝进文,黄初元年曹丕即位昭告天下取代汉室立魏^①。鄂伦春嘎仙洞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魏世祖拓跋焘委派李敞祭祖摩崖^②。唐代长庆三年(823)西藏拉萨大昭寺立唐吐蕃会盟碑。云南曲靖一中存有明政三年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因突厥阙特勤去世,玄宗派使者前往吊唁并制御书刻《阙特勤碑》(光绪十五年在鄂尔浑河上游呼舒柴达木湖畔的喀拉和林遗址,即今蒙古国林赛因诺颜部哲里,发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刻《阙特勤碑》,同时发现的还有《九姓回鹘可汗碑》、《苾伽可汗碑》^{[4]437})。安禄山叛乱平定后,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元结特撰《大唐中兴颂》摩崖于湖南祁阳浯溪。河南濮阳有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回鸾碑》。云南大理有《元世祖平云南碑》(1304),山西、陕西交界处黄河龙门口禹王庙存元代圣旨碑,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代的立皇后玉册文拓片,桂林中学现存元至顺帝封孔庙碑^③,还有各类保护佛教、道教、景教圣旨碑刻。明代朱元璋统一天下宣扬天命依归,御书《周颠仙人传》置于庐山之巅。清朝定例,每次平叛昭告天下,必泐碑于太学,如康熙四十三年平定厄鲁特噶尔丹(存桂林)、六十年平定西藏(存拉萨)、雍正三年平定青海(存桂林)、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存桂林)皆有御书、还有承德普陀宗承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1771)等。

朝廷法规政令通常也借勒石告示天下,特别是在清代,法制渐明,更为普遍,各地此类碑刻多不胜数,内容无有不及。涉及治安交通者如《桂林石刻总集辑校》所载道光年间桂林府制《为端午节龙舟赛事禁令》、《严禁匪盗赌碑》、《禁止容留游匪窝窃聚赌》,咸丰年间《广西巡抚禁封船只布告碑》、《严禁盗卖盗葬等告示碑》,临桂县《限制义渡勒索行人告示》、《广西按察使司告示禁止毁树碑》、《临桂县禁牧告示》等几十件。涉及工业发展以及贸易者如《广西石刻总集辑校》所载乾隆六十年《灵川县示谕贸易碑记》,富川县告示《奉县封禁坑场碑》,广西巡抚告示《贵县廪生请抚宪封禁开矿》。著名的还有苏州所藏康熙四十年的《苏州府约束踰匠碑》,雍正二年(1734)苏州的《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等。

地方各级政府有要事通常也刻石记录,如曲阜孔庙存汉碑《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记述为祭祀孔庙设官^{[5]卷八};陕西华阴西岳庙《西岳华山碑》记述设祭祀官^{[5]卷十一};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摩崖于陕西汉中褒斜古道的《石门铭》,记录了我国最早在当地开通以及续修栈道的过程;宋代度宗咸淳六年

(1270)章时发作《静江府修筑城池记》摩崖在桂林鸛山,记述了修建桂林城的过程以及使用的人力物力,有公示之用。

这些碑刻记事有大有小,多与国事有关,成为政府与百姓勾通的重要方式,反映了一定时期国家的治理现状。

二、變理民生

石刻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对于民生的正常运行发挥了很大作用,几乎成为社会运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体体现在:

一是记事。古人有大事则记,如地震碑刻,唯不常见,常见者大概包括以下方面:兴办维护公益事业,彰善抑恶。如贺州市玉坡村乾隆四年(1739)刊《龙珠庙记》,鄂昌乾隆十一年(1746)兴安县秦堤龙王庙刻《重修龙王庙碑记》,杨仲兴兴安县乾隆十二年(1747)刊《重修分水龙王庙碑记》,杨锡□横县乾隆四十一年(1771)刊《重塑满堂神将碑记》。又有龙胜县江底乡泥塘村嘉庆元年(1796)刊《建桥集资碑》,平乐县榕津村嘉庆十一年(1806)刊《鼎建戏台碑记》。此类碑桂林尤多。桂林同治八年(1869)立《重修龙泉井并井边街碑记》,桂林东安街圣母祠同治十二年(1873)刊《黎庶椿等重修古井碑记》,桂林光绪十八年刊《唐启藩开井碑记》,桂林光绪五年刊《宝积山植树碑》,桂林光绪十六年《曹谨堂植树题名》,桂林叠彩山木龙洞雍正十年(1732)刊刘大任《收埋棺柩碑记》,等等。懿行碑、德政碑亦属此类。恶行碑是后起者,如桂林兴安县灵渠四贤祠内有民国五年公立《吕德慎劣政碑》指斥其“浮加赋税,冒功累民,兴安知事吕德慎之纪念碑”,可见民国时民主意识的崛起。

二是传播生活常识。如北京1971年发现的宋代天圣年间刻针灸图经碑,明刻陕西药王山《海上仙方碑》与摘录孙思邈《千金方》的《千金宝要碑》,西安有张旭书草书刻的《肚痛帖》,桂林刘仙岩刻吕渭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刊《养气汤方》,乾隆间刻于拉萨的《劝人种痘碑》等。这些碑对推广医学知识应该是发挥了作用的。吴仲复于宣统三年在桂林木龙洞摩崖《崇华医学会》碑,推动了现代医学观念的普及。

① 欧阳修《集古录》卷四、洪适《隶释》卷二三、王昶《金石萃编》卷二三皆收录。

② 该摩崖1980年7月由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文物工作站的米文平先生发现(见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1-7页)。

③ 凡引桂林之石刻皆见杜海军著《桂林石刻总集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版。

传播天文知识者如河南登封唐僧一行刻《周公测量台》，传播地理知识者如苏州博物馆所存南宋黄裳制《地理图碑》也当属此类，且世有名作。

三是通过刊石宣传各种政策规约，约束人们不当行为，倡导正义，打击邪恶，维护百姓日常生活正常有序地进行。此类碑刻最普遍：如维护地方安全的乡规民约，广西罗城县康熙五十八年（1719）刊《小长安何家众立禁碑》^①，道光年间合街公立《公议禁约碑》、《萧家里等七村公议禁约碑》，恭城县上炉村乾隆四十四年（1779）刊《众立禁碑》，光绪年间桂林阳家村《公议禁条碑》、桂林八街《公议禁约》、东郊阳家村《公议禁约》碑，光绪三十三年立临桂县判决毛村、大宅江、钓鱼山村、桑林村、石家渡村、新宅村、陇上村等七村《灌溉用水事布告》等。

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的碑刻也不少，如北京马甸伊斯兰教清真寺存康熙十一年《公议整顿寺规碑记》，山东济南府礼拜寺内存康熙九年刻薛宗俊撰《永禁三掌教世袭序》^{[4]1148}，广西富川县乾隆三十四年（1769）刊《传芳堂族规条列》。

刻石契约告知邻里，用于发挥契约约束力者也甚多。如河南偃师县存东汉建初元年《大吉买山地记》^{[6]卷八}；建初二年《汉侍廷里父老 儗买田约束石券》记载买田事^{[7]259}；山东莒县西孟庄庙墓出土东汉建安三年刻《宋伯望买田记》；晋咸康四年（338）刻《朱曼妻薛买地宅券》；桂林乾隆五年临桂县颁发钵园四至地界摩崖，标明买地与卖地之人；乾道八年，桂林靖江府给僧人了达颁发护园执照摩崖，批准了达管理桂林青秀山僧舍；道光四年桂林阳文宗《卖房契碑》；僧维昆道光十九年（1839）夏月刻《钵园四至地界碑记》；同治年间桂林董福弟等人为《木龙洞义渡具结碑》；民国时龚仲英《卖屋契约》刻石；桂林阳家村道光二十九年立《众议拨税碑记》。商会会馆碑等亦属此类。总而言之，买卖契约石刻代代皆有。

三、推动教育发展

刊刻教育政策、规章制度以及教材，石刻在中国的教育发展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其一，刊刻教育政策，宣传教育规章制度，为学子指明努力方向。政府有关教育的法规首先是刻石学校，如宋代文彦博作《京兆府小学归》，按年龄严格规定学生的学习功课（《金石萃编》卷一百三十四）；《大观圣作碑》、《耀州淳化县御制学校八行八刑之碑》记载“八行八刑”，规定了当时人才的选拔条件以及选拔等级等。柯昌泗《语石异同评》论石刻典章又以宋徽宗《御制政和五礼新仪》，颁行天下，最合此

例。^{[1]212}又如光绪八年（1882）刊《广西巡抚为各书院膏火定例碑记》记载：“膏火向有定额，边课本较内地诸生有增。卷查太、泗、镇三府属边生来省肄业，考列超等者，每名月给膏火银二两。考列特等者，每名月给膏火银壹两。由府汇同各书院生童膏火具文，请领给发”，则更详细地规定了边地学生在内地学习期间享受国家优惠待遇，以及根据学习成绩定级别领取膏火的数额的规定，有利于鼓励边地教育的发展。

又有各类学校规程刻石学府，著名者如南宋时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著《白鹿洞书院揭示》后，南宋理宗诏颁各州府县，令立石刻于学宫。教学的礼仪制度、行施程序也刻在学府，如大德元年将释奠图刻于桂林府学，供学子模仿学习。杜与可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刊《静江路修学造乐记》也直接与府学教学有关，至今碑刻犹在。

其二是刊刻教材，汉代以来各级学府多将儒家经典刻石供学子抄录习读。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清朝末年，儒家经典一直是不可更易的学校教材。这些教材因古代印刷术不发达以及纸张缺乏，主要靠学生手录，辗转传授时日渐久，不免出现一些舛误，影响教学效果，因此便有了东汉太学奉旨刊刻五经之事。《后汉书》载：“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颺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8]1990}从此，历朝学校刻经于石，就成了绵延不断的重要的教材颁授方式，从汉朝六经直刻至清朝的十三经，阎若璩这样总结：“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书六经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此所谓《一字石经》也。魏邵陵厉公正始中，邯郸淳书石经，亦立于太学，此所谓《三字石经》也。晋裴頠为祭酒，奏修国学，刻石写经，是为《晋石经》。后魏孝明帝神龟元年，祭酒崔光请补汉所立《三字石经》之残缺，此魏立也，非汉。唐文宗开成二年，国子监《九经石壁》成，从宰相领祭酒郑譔之请也，今尚在。孟蜀广政十四年，镌《周易》，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公羊传》工毕，是为《石室十三经》。仁宗庆历初，命刻篆隶二体石经，后仅《孝经》、《尚书》、《论语》毕工，是为《嘉祐石经》。高宗绍兴间，亲书《易》、《书》、《诗》、《左氏传》、《论语》、《孟子》及《礼记》五篇刊石（笔者按：《武林金石志》卷二载，共七十

① 凡引广西诸县石刻皆见杜海军著《广西石刻总集辑校》，待刊稿。

八碑),孝宗淳熙四年,诏建阁以覆之,是为《绍兴御书石经》。盖古来凡七刻矣,为附其说于此。”^{[9]92} 阁若遽未及总结的还有其后乾隆五十六至五十九年(1791—1794)续刻的《清石经》(又称《乾隆石经》)。这套石经规模庞大,包括乾隆谕旨与和珅奏表多达190件石,当时立于国子监(今藏北京),全刻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共十三经,成为权威的儒家教材。

刊刻儒家经书不仅在太学,其他各地也多有散刻。如西安碑林存《石台孝经》,四川遂宁摹刻的宋高宗书《真草孝经》,重庆大足古文《孝经》,姜里城有嘉靖刻文王《易》,乾隆《山东通志》载长青雉兔屯石刻《孝经》等。还有将经文片段刻于各地者,如南宋司马备刻《易经·家人》于融水、陈邕刻张栻书《论语·问政》于桂林弹子岩等。石刻为天下学子求学进身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反映了我国教育史进步的阶梯性成果。

其三是修建学校与学记的碑刻。研究欧阳修《集古录》以及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金石录的可发现,学记类石刻当始于宋代。宋代以后,学记石刻数量剧增,量大文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进步,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学记内容十分丰富,或阐述建学的重要性,如绍圣元年吴柔嘉撰《高陵重修县学记》云:“学者之性如泉源,导之为江河,塞之为污池。”^{[5]466}或记述学校发展过程,如道光六年(1826)李士林刊《粤西康大中丞广秀峰书院肄舍碑记》,记述桂林秀峰书院增建学舍事,说明原有讲堂五楹、厅舍五楹、东西厢各十五楹,嘉庆五年增修寝室五楹、东西厢各三楹,立汉司空南阁;道光四年,大中丞兰皋康公莅任,又在院内大门之旁,增舍七椽,又捐金二百余两购顾氏居,前后增建凡三层,层各若干房。曹驯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逊业堂记》,唐景崧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奎光楼记》等皆记学校的兴建。或记述学校学生、老师的日常生活待遇,如柳州市柳侯祠乾隆十三年(1748)夏四月刻《龙城书院碑》,乾隆四十七年(1782)桂林朱椿刊《秀峰书院经费记》等皆是如此。这些石刻成为今日研究我国教育史的稀见资料。

四、传播宗教信仰

宗教在我国历史上发展是比较全面的,有本土产生的道教,有外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有些宗教在中国得到较大的发展。作为宗教实践的重要形式或发展过程,石刻文献中都有充分反映。石

刻记载了各类宗教发展的起始,如唐刻记录景教在中国发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自明代被发现即驰名中外,它是有关唐德宗李适建中二年(781)为传入我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记事的一件名碑,用中文和叙利亚文载明了景教从波斯传入中国后在长安建寺和传教的情况。又如陕西户县重阳宫碑林集中了众多元代以来的道教碑刻,其中《十方重阳宫万寿记》、《全真教祖碑》、《重阳祖师仙迹记》等成为研究道教全真派创立、教义思想的最珍贵资料。桂林南溪山刘仙岩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刊《畚先生论金液还丹歌诀》是道教炼丹的重要文献。陈智超、曾庆瑛抄于四川灌县文管所拓本的《敕赐玄宗传之碑》由虞集奉敕撰文,赵孟頫奉敕书丹撰额,记载了正一派大宗师张留孙以前的八代本师及陈义高的事迹,是元代道教正一派的重要史料。^{[10]5} 还有广西宜州存宋代元符戊寅年(1098)刊《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罗汉圣号》,图文并茂。广西宜州宋代绍圣四年(1097)刊《婺州双林寺善慧大士化迹应现图》,描写梁武帝时傅大士在双寿树下修行的过程。广西崇左万历年间知州黄河汉立《上帝碑》,虽然只有“上帝碑”三字与年月落款,已可见天主教在中国明代传播的广泛。

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得到大发展的主要是道教与佛教,这从经文的刊刻可以见得。如唐代河北易县龙兴观一经幢刊刻《道德经》,而佛教石刻在所有宗教石刻甚至所有石刻中是最有成就、数量最大的一类。在佛教石刻中成就最为惊人的是佛经石刻,叶昌炽对佛经刻石之多很是惊讶,他说:“余尝怪释氏刻经遍天下,房山雷音洞二千三百余石,伟矣。中山之法果寺,宝山之万佛沟,或建石,或摩崖,莫不大书精刻。”^{[1]184} 佛教的经文刊刻确实成就非凡,如北魏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占地亩余,字径每个50厘米,至今仍有字存;还有山东邹县摩崖岗山、铁山,河北邯郸唐刻维摩经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叶昌炽所说的房山石经。北京的房山石经刊刻始于隋朝,终于辽、金。几个朝代的持续刊刻,完成了《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维摩经》、《胜鬘经》、《金刚经》、《佛遗教经》、《无量义经》、《弥勒上生经》等15060件的刊刻^{[11]88},成为我国文化的一大奇观,印证了中国佛教史发展之辉煌。

石刻文献对于宗教研究的价值,已经为学者注意,如著名学者陈垣搜集辑纂《道家金石略》,借助石刻文献研究道教发展,为学界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习俗几近宗教,是人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石刻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推广功能,如桂林泰始六年(470)刊《欧阳景熙地券》、永明五年(487)刊《秦僧猛

地券》、正统四年(1439)刊《靖江王府内使张法禧地券》，反映的是丧葬习俗。龚翔麟康熙乙未(1715)刊《伏波祠迎送神歌》反映的是祭祀习俗。贵港市南山寺雍正十一年(1733)刊孙超《南山祈雨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吴元臣康熙五十九年(1720)刊《新建痘神庙碑记》反映了人们对疾病与神灵关系的认识。此等碑刻内容多不入正史，价值也别具一格。

五、记录私人行迹

石刻最普遍的应用在于墓铭或志，无论地位高下贵贱，为去世者立碑作墓志在东汉以后就十分普遍，直到今天这种风气依然在延续，这大概来源于国人讲究三不朽的传统，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者是也，其实只为一个立名而已。如《后汉书·窦宪传》载窦宪公元89年在燕然山打败匈奴，勒石记功而还。《晋书》称杜预好为后世名，为自己刻碑，“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岷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12]¹⁰³¹无非是说不管将来历史如何变迁，自己的名字总会显耀于世，这是人们立碑留名的一个典型实例。由于古人这种立名的强烈观念，所以我国廿四史也就做成了一部人物传记大集结，但能进入史书的人物多为王侯将相非常之人，普通人要传名后世就只能自想办法。由于石料容易获得，不受任何限制，使用方便，所以借助石刻立名便成了众人的选择，或埋地为志为铭，或置墓前为碑为碣，标明自己的姓氏履历业绩等，以求流传后世。因此，我国历史上留下了无数的石刻碑铭，我们仅以所发现的唐代墓志铭之多就可见一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一书录墓志3676方，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唐代墓志汇编》的基础上作《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续收墓志1564件，两编合起就有5240件，想必这只是部分，是唐代的部分，更是历史上的部分。如果设想将历史上所有朝代曾经存在过的墓志铭完全统计，不知将是一个何样的数字，因为宋代以后的石刻发展更为普遍与繁荣，反映社会生活的程度也必更深更广泛。

数量众多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这些墓志铭作者多有名人与显要，所铭之人也往往成绩可为世道。如“《东观汉记》曰，窦章女，顺帝初入掖庭为贵人，早卒。帝追思之，诏史官树碑颂德，章自为之辞”。又言蔡邕撰碑文之多，范晔《后汉书》曰郭林宗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卢植曰：“吾为碑多矣，皆有惭德，惟郭有道碑无愧色耳。”^[13]^{卷五八九，文部五〇}东汉时孔融等人撰碑文多以蔡邕

碑为模范：“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者莫高蔡邕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句无择言，周乎众碑莫非精允，其叙事也核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辞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创有慕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于碑，温、王、郗、庾词多支离，桓彝一篇最为辩才矣，此碑之所致也。”^[13]^{卷五八九，文部五〇}东汉以后，为人作墓志铭成了文人的一项重要创作内容，如韩愈为人写墓志铭、墓碑等在李汉编《昌黎先生集》八卷中就占有二卷之多。

碑志在文人著作中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二十四史人物传记的一个大的补充。

六、传播文学

文学的传播包括作品传播、作者传播、文学理念与创作方法的传播。作者作品得到传播，文学理念与创作方法自然也将随之得到传播，因此我们论述作品传播、作者传播、文学理念与创作方法的传播也自然就在其中了。在古代，文学的传播就方式而言，无外乎口头传播或将文字书于竹简、木牍、丝帛、纸张、金石等。在这些方式中，比较而言，纸张、竹木寿命皆短且易损，更有甚者受到经济力量或社会地位的限制，因此，文学的传播人群也就是在文人或者官员富人的圈子内，一般百姓或无意受其影响，或无力受其影响，文学的传播因此而受到限制。然而，石刻这种矗立通衢，或摩崖名山，多在公众易到易聚之处，受众范围大，传播人群无拣择，时间持久，在诸多传播方式中，成为传播文学的重要方式，也成为人们不经意间最易接受的一种方式。

就作者传播而言，许多人借碑刻得扬文名。晋人戴逵作郑玄碑，为文自镌，时人莫不惊叹，以为“词丽器妙”。吴郡人陆云制《太伯庙碑》，吴兴太守张缵罢郡，途经读其文，叹美以为“今之蔡伯喈也”，至都言于高祖，高祖召陆云兼尚书议郎。唐人李邕长于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持金帛往求其文，受纳馈遗至于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其《韩公行状》、洪州《放生池碑》为人推重，以恩例赠秘书监。唐长庆间工部尚书冯定作黑水碑《画鹤记》名驰新罗。孙兴公作永嘉郡，有《敬夫人碑》因得到郡人尊重。张说文章构思精敏，长于碑志，为世认可。宋人李潜代杨凝撰吴越王钱鏐《神道碑》，文采道丽，时辈咸称。任谅为怀州教授，徽宗见其作《新学碑》，赞美其文，擢提举夔路学事。金人韩昉作《太祖睿德神功碑》当世称之。元人揭傒斯撰《明宗神御殿碑》，获赐楮币万缗，白金五十两。此为

例举,皆是言碑刻对作者扬名的作用。

鉴于碑刻有助于扬名,名家也多喜为之,如唐太宗李世民撰五言诗《帝京篇》、《晋祠铭》,唐明皇李隆基撰书《鹤鹄颂》、《送李邕赴滑州诗》。李白撰书《隐静寺诗》刻于繁昌,《题安期生诗》刻于掖县。颜真卿撰书《宋璟碑侧记》刻于沙河,又有《唐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丞相上柱国赠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铭并序》。元结的《大唐中兴颂》、皇甫湜撰《浯溪诗》刻于祁阳。韩愈书《白鹦鹉赋》刻于海阳,《送李愿归盘谷序》在孟州济源,《徐偃王庙碑》在衢州,《南海庙碑》在广州,《罗池庙碑》在柳州。柳宗元在桂林有《訾家洲记》,在柳州有《柳州山水记》、《重复大云寺记》、《柳州并铭》、《文宣王庙碑》。白居易撰《香山寺碑》、《修香山寺诗三十韵》、《醉吟先生传》、《八节滩诗并龙门二十韵》、《醉吟先生白公西北岩石碣》、《白乐天游济源诗》。李商隐撰《白居易碑》。冯道撰书《晋移文宣王庙记》刻于大荔。欧阳修撰《醉翁亭记》刻于滁州、鄱陵,《丰乐亭记》刻于滁州,刻《思颖诗》等三十篇在颖水。苏轼《表忠观碑》在临安,《昌黎庙碑》在潮州,《伏波庙碑》在雷州,《峻灵王庙碑》在昌化。以上所论是名人,其实,以总量而言,文刻流传最多的还是那些不太著名的甚至是文学史或历史上根本没有地位没有留名的文人,如张世南《游宦纪闻》载一刻于进贤,再刻、三刻于德兴的无名氏诗歌,这些碑刻文学在传播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人借碑扬名,碑因人传文。碑刻所至泽及地方,而文学遂得以弘扬光大,碑刻的传文之功至是而见。

碑刻在文学方面的传播之功又表现在对文学创作活动直接的推动。一是兴起即时唱和的集体创作,此类碑刻如唐代汝州刻石《武则天幸流杯亭宴诗》,记录武则天圣历三年幸汝州,宴饮于州南流杯亭,与群臣分韵赋诗,参与者有吴泽塔、武三思、李峤等人。又如宋咸平年间永州摩崖《送新知永州陈秘丞瞻赴任》,有朱昂等五人唱和。太平天国十年(1860)宜州有石达开与部下十多人在宜州白龙洞唱和摩崖。民国间北流勾漏洞刻时任县长关锡琨因募捐修葺勾漏洞竣,复作诗文纪其事,征获诗赋歌词记序等一千二百五十一首,以其中七首并序刻石。桂林此类摩崖最多,如唐人张浚、刘崇龟的杜鹃花唱和诗。宋人有章岷、崔静唱和诗,刘谊曾公岩记与陈倩等七人唱和诗,米黻程节唱和诗,张洵、尚用之等五人蒙亭唱和诗,任续还珠洞唱和诗,张孝祥、张维七星山唱和诗,朱希颜与胡长卿、刘褒千叶白梅唱和诗,朱希颜与胡长卿、刘褒南溪山唱和诗,李曾伯、丰沆登千山唱和诗。明人陈辉、胡智七星岩唱和诗,胡智、陈辉、王骥三人虞山唱和诗,彭琉、李棠等四人

谒虞帝庙唱和诗,李棠、夏埙等十一人龙隐洞唱和诗,林维翰、龙鲤等五人七星岩唱和诗,包裕与陈阳等四人唱和及哀挽胡宪副诗,徐翊、黄一隆等四人叠彩山唱和诗,周进隆、翁茂南等四人唱和诗,沈林、周进隆等五人唱和诗。清人胡文华、彭而述七星山唱和诗,黄赐猷、吴允言独秀峰唱和诗,吴邗蕙竹道人刘仙岩唱和诗,夏仪、喻元准等叠彩山唱和诗。

二是前后相继唱和的创作,如唐人元结在湖南祁阳作《大唐中兴颂》摩崖浯溪,自此以后,历代名人追随,留下了宋人黄庭坚、米芾、秦少游、李清照、杨万里、范成大,明代解缙、董其昌,清代何绍基、袁枚等人的题刻,虽非全为唱和而作,但明显受元结前作的影响。又如桂林独秀峰太平岩明代正统十二年(1447)庄简王朱约麒《独秀岩记》附诗云:“碧峰禹迹几经今,上接云霄匪不钦。绝顶两轮乌兔跃,幽禽齐奏管弦音。无时树木冬森翠,最喜林峦夏有阴。每展黄庭岩畔玩,默知天地化工深。”此后相继步韵而作者有正德六年(1511)朱约麒,嘉靖十二年(1533)张经、靖江庄惠王朱邦苾,嘉靖十五年诸演等二十四人的唱和诗,持续近百年时间。又如清人谢启昆在桂林南溪山有《和元人韵四首》、《题龙隐岩和方信孺韵二首并记》、《栖霞寺和陈文简公诗二首》等。这些前唱后和之作无疑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碑刻在文学传播方面最直接的功用是传播文学作品,彰显文学的观念和魅力。如宋卢襄撰《西征记》载,哲宗元符三年在国子堂前见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其间刻有魏文帝《典论》系传播文学观念;而欧阳询书行书《九歌》刻于丰州、润州;《兰亭序》感事兴怀太悲,萧统《文选》不取,唐太宗得右军兰亭序真迹,在定武刻以玉石,成为最受推崇之文本,文也因此得传。许多文章因石刻而广为人知,元结的《大唐中兴颂》、梁安世的《乳床赋》、题云华阳真逸的《瘞鹤铭》等皆是如此。许多石刻在历史上一刻再刻,跨域时间与空间,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苏轼的《赤壁赋》等,成为历史上传播文学的一种持续不衰的方式。

人们从碑刻接受文学也成为习惯,如《世说》载曹操与杨修行军曾读曹娥碑。《三国志》载王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使背诵不失一字。邓艾随母至颖川,因读陈实碑文“文为士范,行为士则”,遂改名曰“范”,字曰“士则”。祢衡于章陵见蔡伯喈所作石碑,因叹其好,而过目不忘。韦绚撰《刘宾客嘉话录》记载欧阳询行见古碑,由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方去,数百步复还,以至于布毯碑下坐观,甚至因宿其傍三日而去。到了宋代,名人也多借碑学文,如王禹偁“见碑时下岸”,“几处古碑停马读”(《送同年刘司

谏通判西都》)。范成大“读碑索句仍投辖,谁是扬州控鹤仙”(《风月堂》)。刘过“摩挲墓铭看,久立读碑阴”(《聿追庵》)。刘克庄“春风萧寺同登塔,落日荒台共读碑”(《忆毛易甫薛子舒》)。这些例子可见当时文人钟爱石刻蔚为风尚,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刻在宣传文学方面功不可没。

以上我们从六个大的方面论述了石刻的历史功能,这仅是根据存量多的石刻立类,它如水文碑、地震碑、路标碑、地界碑等数量少者或可就近归入它类,就不再专门论述。可以这样说,石刻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曾发挥过无可替代的功能,更重要的是,石刻作为文献形式保留至今,又显示了文明发展的足迹,因而值得后人爱护和开发。我们今日探讨石刻在历史进步中发挥的功能,目的是要进一步开发、利用石刻的历史文献价值,以便更好地认识文明的进步。

[参 考 文 献]

[1] 叶昌炽,柯昌泗. 语石·语石异同评[M]. 北京:中华

书局,1994.

- [2] 杨殿珣. 石刻题跋索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3]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 [4] 金其桢. 中国碑文化[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 [5] 王昶. 金石萃编[O]//续修四库全书. 嘉庆十年刻,同治钱宝传等补修本.
- [6] 陆增祥. 八琼室金石补正[M]//续修四库全书. 吴兴楼氏希古楼刊本.
- [7] 毛远明. 碑刻文献学通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8]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9] 阎若璩. 尚书古文疏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0] 陈智超. 校补前言[M]//陈垣. 道家金石略.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1] 徐自强,吴梦麟. 中国的石刻与石窟[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12]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3] 李昉,等. 太平御览[O].《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刊本.

Historical Function of Stone Inscriptions: The Seventh Study on Guangxi Stone Inscriptions

DU Hai-jun

(College of Ar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perty of easy obtaining, strong water-resisting, durable wear-resisting and long preserving, stone inscriptions won people's favor 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and was widely used in social life such as political announcement, people's livelihood development,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ligion propagation, historical recording, the propagation of literary and calligraphy, etc.. Today the information o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seems to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but people tended to treat the stone inscription as one part of the epigraphy for a long time so as to affect the full use of its documentary value.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 function of stone inscriptions is helpful for scholars in deepen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its documentary value, prompting it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nd furthering all kinds of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Key words: Guangxi; stone inscriptions; document; function

[责任编辑 阳 欣]